

目 录

- 一、前言 ..
- 二、徐海东将军的历史功绩.....张友高、李新文 (1)
- 三、黎元洪轶事.....夏邦华 (8)
- 四、熊斌简介.....魏邦卓 (13)
- 五、爱国爱乡的李琰先生.....陈光旭 (16)
- 六、怀念祖父陈佑文.....陈文秀 (24)
- 七、开明人士谈继仁.....谈国维 (26)
- 八、我的父亲钟自毓.....钟修顺 (29)
- 九、战士的妈妈喻兰芳.....刘桂芬、方敏文 (32)
- 十、我的回忆.....陈贤炳 (36)
- 十一、夏店工商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高继先 (47)
- 十二、忆建国前夕的礼山县师资讲习班.....段守纪 (52)
- 十三、回顾旧私塾的教与学.....左安治、夏安民 (56)
- 十四、回忆我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时期做统
战工作的几件事.....魏光考 (58)
- 十五、回忆我当保长时的几件事.....肖纳忠 (63)
- 十六、李先念师长重视教育事业.....钟修顺 (68)
- ✓十七、歼灭二郎店日寇亲历纪实.....闻名全 (69)
- 十八、三里城伏击战——桂军英勇抗日事迹之二
.....申志宵 (77)
- 十九、日寇占据河口镇及其败逃.....邓思恭 (84)
- 二十、日寇偷袭团墩畈.....雷绍俭 (95)

二十一、丰店观音庙阻击战·····	
李玉耀、戴伯成口述、赖新民、李鸿战整理 (97)	
二十二、智取歪歪寨、活捉刘亚卿	
——纪念新五师开辟大悟山抗日根据	
地四十五周年·····	徐东峰 (101)
二十三、徒手擒敌寇·····	陈安远 (103)
二十四、我们是朋友·····	陈安远 (108)
二十五、礼山县名考·····	夏邦华 (110)
二十六、小城沧桑记·····	魏邦卓 (113)
二十七、革命洞·····	余文杰 (117)
二十八、我县首次发现的窖藏青铜器·····	付智铭 (122)
二十九、吕王城轶闻·····	李御寰 (124)
三十、吕王城文物——惜字炉·····	李御寰 (127)
三十一、忆芳畈锅厂·····	徐东峰、石天开 (128)
三十二、黎前大总统国葬典礼册·····	
·····	席荣辉、宋华璋征集 (133)
三十三、谈氏族谱序·····	
附：文天祥简介和编者按·····	
·····	胡光勋、席荣辉、宋华璋征集 (150)
三十四、玉皇李小考·····	徐东峰 (152)
三十五、袁黎结亲·····	徐允明 (153)

徐海东将军的历史功绩

张友高 李新文

徐海东将军作为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在海内外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和深远的影响，曾经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刘少奇、邓小平等革命领袖的高度评价。但是，在他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历程中，历尽坎坷，多次受到左倾路线的迫害和冲击，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多次蓄意贬低将军的历史地位。作为鄂豫皖苏区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今天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倡导下，缅怀革命前辈，很有必要重提他的历史功绩。

提到徐海东将军，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他从窑工到将军的经历。他历任士兵、北伐军排长、农民自卫军队长、赤卫军大队长、红军团长、师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等要职，这些已编进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中。在这篇短文中，没有必要再替将军抄写履历，而只想谈谈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值得若干代历史学家考证研究的事实。

点燃农民起义的烈火

一九二七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影响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的重大政变——蒋、汪反革命政变。徐海东将军以一位

年轻的北伐军少尉军官的身份，从大革命失败的余烬中走过来，回到家乡大别山区。作为中国革命重要根据地的大别山区，很快传来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春风，因为那些公开的、未公开的共产党人在民间的活动，鄂豫皖各地都在实践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积极准备农民暴动。徐海东找到了黄陂中共党的县委书记陈金台。经过交谈，他们很快组织起一支农民自卫军，虽然从十几个人八发子弹一支手枪起家，但不久就发展到三百多人的武装。在这支队伍有里，很多是经过他亲自动员来的亲属和密工朋友。就是这支武装参加了“黄麻暴动”。作为暴动的外围力量，他们的英名已载入中国农民运动的史册。“黄麻暴动”失败后的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徐海东组织和领导了鄂东地区很有影响的“汪洋店年关暴动”、“夏区年关暴动”、“芳畈暴动”，点燃了大别山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暴动失败后，徐海东率领起义军打上木兰山，与吴光浩的队伍汇合，这支队伍成为鄂豫皖红军的最初来源之一。如果有人要探索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和鄂豫皖红军历史的源头，只要研究徐海东早期在家乡的革命活动经历，就能得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领导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

鄂豫皖红军的成长经过了红十一军——红一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几个阶段。伴随着革命军队的壮大，徐海东将军也由鄂东军警卫团团长到红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三十八团团长，到独立四师师长，红七十四师师长，红二十八军七十九师师长，到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成长为第二次组建的红二十五军军长。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在张国焘路线的干扰下，历经磨难和

波折，以至把革命推向危险的滩头。徐海东将军与苏区忧患同当，喜乐相依，多次挺身而出，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和苏区的事业。他参加和指挥过苏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他以作战勇敢、指挥机敏果断出名，使国民党方面的蒋总司令也闻之心惊，而视为畏敌。

一九三二年秋，因为张国焘顽固地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的结果，导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失利，苏区的斗争处在异常残酷复杂的环境中，而张国焘则采取右倾逃跑策略，于极度恐慌中丢下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百五十万苏区人民率军西逃。鄂豫皖的革命形势十分危急。此时，徐海东将军与刘士奇率部出击皖西，牵制追剿敌军，与郭述申等皖西特委成员汇合，组建了红二十七军，稳定了皖西和鄂东的局势。

肃反扩大化运动和敌人的“围剿”一样，严重地残害了苏区的革命事业。徐海东将军无私无畏，不顾个人安全和蒙受打击，力主正义，挺身保护了一大批干部战士，为鄂豫皖苏区后来的恢复和发展保留了革命的种子。许多经过将军保护的老同志至今记忆犹新，作为“铁包公”形象的将军，使人激动难忘。

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组建后，继续推行张国焘的“左”倾路线，盲目决定在七里坪围困强敌，差点把鄂豫皖苏区这支最后的主力红军彻底葬送。因为徐海东将军联合军长吴焕先坚决反左，力排众议，以被赶出会场个人蒙受耻辱为代价，换得撤出七里坪之围，挽救了这支部队。后来这支铁军屡遭挫折，损失严重。徐海东将军率领部分队伍在皖西活动，却有很大发展，给危机中的红军官兵带来了希望。一九三四年四月底，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合编后，将军升任军长，率领新军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的五次“围

剿”，极大地丰富了红军山地游击战术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游击战术专家的军事地位。

率领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正是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一个月的日子，红二十五军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了长征的伟大战略行动。这个行动是程子华从中央苏区来鄂豫皖传达中央指示后由省委决定的。但挺进陕南的行动方向却是副军长徐海东和军政委具体商量选定的。这一选择决定了红二十五军的命运。千里征途遭遇了数十个团敌军的围追堵截，几次险遭全军覆没，但几次都是徐海东将军和吴焕先政委亲自上阵，挽救了危局，从而保证了全军顺利翻越秦岭，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这时已经过了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等省的转移，入陕后又开展了两次反“围剿”斗争，徐海东将军指挥红二十五军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以大回旋的行动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然后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心区，全歼敌两个旅，击溃了敌两个旅，活捉了两个旅长。接着我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前锋直指西安南郊。敌人的“围剿”就这样破产，我新开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红军队伍得到了壮大和发展，终于转危为安。而这一路上，红军部队先后经历了吴焕先军政委牺牲、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军长程子华重伤睡着担架行军，徐海东将军一肩重任：负责着副军长、代理军长、代理军政委、代理省委书记等职的工作，坚决顽强地把这支部队从鄂豫陕带到了陕北，有力地接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方针的形成与徐海东将军和他的红二

十五军有极其重要的关系。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境的懋功地区会合。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大会合。中央红军深受王明路线之害，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长征转移途中，党中央曾经有过“去湘西会合二方面军，建立川黔根据地”、“建立川陕根据地”的设想和困惑，敌人的重点“围剿”和环境的异常恶化，使得中央领导同志那些高瞻远瞩的设想难以实现，因而带来了党和军队的困惑。正是在两军会师以后，中央从情报中和红四方面军那里得知，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撤出后，历经艰险到了陕南，正在陕西和甘肃交界地区进行着颇有成效的游击战。在这以后，中央又听说陕西还有以刘志丹为首的地方部队进行着卓有成效的斗争，并建立了小而稳固的苏区。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作为第一支到达陕西的长征部队，为党中央最终确定红军向甘陕方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历史已经写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河口会议首次提出了红军向北发展，创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向，而沙窝会议则明确地、直接地把红军北上开辟川陕甘根据地和领导全国抗日斗争的伟大任务联系起来，最终形成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

在 陕 北 举 行 奠 基 礼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红二十五军的旗帜飘扬在陕北红军大学广场的上空。红旗下，徐海东将军与陕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同志握手欢笑。鄂豫皖红军第一步跨进陕北这块红色土地，陕北的革命随之出现了新气象。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会合以后，组编了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将军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蒋介石曾经在鄂豫皖苏区到处张贴过“捉拿徐匪，赏洋

十万”的告示。这位“徐匪”一进入陕北，蒋总司令更是畏为大敌。于是，迅速集中了东北军主力两个军和高桂慈、马鸿逵的军阀部队，发动了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徐海东将军亲临反围剿前线，发动和指挥了“劳山战役”和“梅林桥战役”，很快就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重挫了蒋军的锐气。红军在胜利中迅速壮大起来，苏区也在迅速扩展。徐海东将军和刘志丹同志为迎接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到来，铺平了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徐海东将军，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由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发动了直罗镇战役。徐海东将军率军作为主力部队参战，并成为战场上模范指挥员。歼敌一〇九师，击毙敌师长。直罗镇战役素来被人称为“为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个“奠基礼”的作战计划，就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采纳了将军的意见后实行的。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这是对徐海东将军实事求是的褒奖。

一九三六年二月，徐海东将军率军东征，直驱山西太原，使阎锡山闻风丧胆。继东征之后，又于同年六月进行西征，打出陕甘宁边区，迎接朱德总司令、左路军、右路军，迎接了二、四方面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城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情况危急，千钧一发，事关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徐海东将军接受周恩来同志指示和扬虎诚将军约请，领兵镇守西安城下，阻拦了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二十万大军的汹汹气势。在此之后徐海东任红军南路总指挥，南进宁夏、察哈尔，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军事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这时，将军已经是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成为党和红军的领导骨干。他领兵保卫西安，决不是单纯从军事角度出发，而是站在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开展军事行动的。

为民族命运领兵抗战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红军改编，徐海东将军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兼政委，率韩先楚团参加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在三四三旅配合下，消灭敌板垣师团。此为共产党八路军开始反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仗，也是中华抗日战争史上的第一大仗。之后，徐海东将军领兵参加反九路围攻，予日敌以重创。一九三八年，为执行毛泽东同志“闪击战”的战略思想，与王震将军一起深入敌后，灵活杀敌。其中以万店战斗最为出色。在晋察冀抗战中，徐海东将军是人们传颂的一位神奇的英雄。

华中抗战伊始，徐海东将军随刘少奇同志亲临华中抗日前线，抱病杀敌，指挥了著名的周家岗战斗，收复了大片失地，赢得了反“扫荡”战斗的重大胜利。他重整新四军支队，对整个江北战场的抗战形势运筹帷幄，为中华民族在华中地区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建立丰功伟绩。将军身经百战，伤痕累累，仍战斗不止。终因积劳成疾，于一九四〇年元月二十八日病倒在华中前线。此后，他躺在病床上坚持学习和斗争，参加了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直到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在郑州病逝时，仍念念不忘党的事业和自己的战场。

对于徐海东将军，历史的评价是公正的。毛泽东同志称他是“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邓小平同志称赞

他“对党一颗红心”。李先念尊称他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老前辈”。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他位居大将。在中外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传奇色彩很浓的风云战将。他的功劳决不止如此，他为民族的解放事业毕生战斗，也不止于他那个八十三人的家族，为革命事业牺牲了几十条人命。在鄂豫皖苏区，在长征途中，在陕北，在晋察冀，在华中，到处都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作为一个领导者和一个战斗者，民族解放史上这些重要战场的胜败危亡，都与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一九三六年，就曾以天才记者的眼光，说他是共产党和红军的领袖人物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人。从窑工到将军，他是红军和党的领导人中唯一一个从普通窑工成长起来的将领。如斯诺所说，中国现代史上的红色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而徐海东将军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难怪他当年在接触红军历史时，不惜重墨，具体而详尽地向全世界介绍这位红军领袖。愿我们中国更多的人了解他，学习他，歌颂他，记住他。

徐海东将军永垂不朽！

黎元洪轶事

夏邦华

所谓“福得星转世”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黎元洪任广东广甲兵船六品花翎（品标）副管轮（副轮机长）。广甲兵船北上

增援威海卫，驶出旅顺口外遇敌，黎躬冒矢石，船被敌舰炮中要害，费能舣，乃自凿沉之，并投海以殉，官兵亦皆落水。凶残成性的日本侵略军竟大肆射杀。当时，清政府的水师主力——北洋舰队，已全军败退，无舰救援，致使该舰官兵绝大多数壮烈牺牲。黎飘流海上，至大连附近才遇救。消息传回黎家乡，黎家河一带的群众纷纷议论说：元洪这次大难不死，定是福得星转世，将来必有重任。

辛亥革命中戏剧性的爆发户

辛亥革命前夕，黎元洪还是清军中的一位混成协统领，相当于民国时期的独立旅旅长。他不仅是一位忠于清室，素与革命无缘的人，而且还是极力反对革命的人，就在起义的当天晚上，他还亲手杀害过革命士兵。可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成功后，出于错综复杂的因素，在革命党人的枪口威逼下，他被推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的宝座，一夜之间成了“首义元勋”、“民国柱石”。从此，他扶摇直上，一跃而成为湖北实力派首领。以后，竟三任民国副总统。继而，在一九一六年六月七日至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一日至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又两度出任军阀混战时期的北京政府大总统。在中华民国史上，他是一位显要的人物。

遮 遮 盖 盖 挽 振 武

振武，张姓，字春山，湖北省竹山县人。武昌支郡师范学堂毕业后，在武昌黄鹤道小学教书。一九〇九年加入共进会。武昌首义爆发后，是最先到达咨议局的党人之一。湖北

军政府成立时，任军务部副部长，对革命多有建树。后因与黎元洪发生矛盾，黎竟密电袁世凯：“请先将张振武调任蒙古调查员，以调虎离山；再候其到京后，伏乞将他立予正法，就地处死。”袁世凯为了镇压革命党人，当然照办不误。遂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五日晚，派人将张振武杀害。张被害后，京、鄂大哗，群起质责老奸巨滑的袁世凯。袁世凯为了转嫁杀戮功臣的罪责，并收“一箭双雕”之利，竟将黎的密电抛出。这一下子，弄得黎元洪手足无措，狼狈不堪。黎于是一方面假惺惺地要求辞去副总统以谢国人；另一方面派出专员，赴京将张的灵柩迎回武昌。湖北及武汉各界，在蛇山抱冰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黎元洪硬着头皮亲临主持。并且在会堂中间挂出他的一副“欲白不愿，欲罢不能”的挽联：“为国家编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义，此心不负故人。”

这副挽联中，既有什么“后世自有定论”的功首罪魁，又有“私心公义，此心不负故人”的呼天号地的赌咒，别别扭扭，遮遮掩掩，不知底细的人，真是莫名其妙，犹如坠入五里雾中。原来这副妙联，的确使黎大都督有难言之隐！

此联并非黎氏所作，而是出自当时的名士周从煊之手，确实写得恰于其份，匠心独具。联中尽管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字里行间，却把黎元洪两面三刀的阴险嘴脸刻划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民国初年，黎元洪虽然登上了副总统兼鄂都督的宝座，但既无基础，又无实力，故欲借大总统，北洋军阀首脑袁世凯的力量，以排除在湖北地区的异己。一九一三年春，黎成

为袁世凯扑灭“二月革命”的有力帮凶，杀害、拘捕了一大批在武昌首义时拥他上台的革命党人，将湖北地区的革命力量镇压殆尽。由于黎元洪毕竟还是借辛亥革命而发迹，且又非袁世凯的嫡系，故袁对黎留在湖北视为心腹大患。于是，正当黎元洪踌躇满志之际，同年十二月，袁世凯发动了突然袭击，特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湖北督军，星夜赴任。段抵汉口，将所乘专列，改为北上专列，机车生火待发后，始进入督军府，“恭请黎副总统立即回京主政”。黎元洪无可奈何，连夜含泪北上，让出了呕心经营的湖北地区。

从瀛台到东厂

黎元洪至京后，袁世凯在名义上仍授他以副总统兼参议院院长之职，又倡议联姻，以其公子袁克欢与黎的千金黎治芳结成良缘，以示公谊私情都超过一般的关系。但实际上，却置黎于监视、控制之下。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副总统的官邸竟被安置在当年慈禧太后囚禁过光绪皇帝的瀛台。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积极进行复辟帝制，黎元洪不满，要求搬出南海瀛台。袁对此也极为“尊重”，特地给他在东厂胡同购置了一幢宽敞的宅院。此宅原来是明代太监魏忠贤的特务机关锦衣卫下属的东厂，专门关押、审讯犯人的场所。从黎元洪曾在湖北大肆杀戮拘捕首义功臣的经历，以及那时的政治处境，联系到当年东厂的性质及其历史主人魏忠贤的所作所为，不知黎副总统有何感受？前瀛台，后东厂，这是项城亲翁（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漫不经心地安排巧合，还是对于黎黄陂（今大悟）这位姻亲的特别关照呢？

旗帜鲜明地反对复辟帝制

袁世凯称帝前夕，黎元洪多方消极抵制。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当了洪宪皇帝后，册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坚辞不受，两次谢绝册封令，三次拒收亲王的俸禄。帝制派骨干梁士诒前去劝说，黎指着大厅一柱说：“你们如果再逼，我就撞死在这里。”使梁垂头离去。袁世凯的“登极”大典，黎亦未参加朝贺。

一九一七年，张勋导演出“拥立废帝溥仪复辟”的大丑剧，黎元洪确有引狼入室之责，但在关键时刻，却旗帜鲜明地反对复辟。并当张勋特派梁芬赴总统府，以封一等功为诱耳，劝黎“奏请奉还归政”时，遭到黎的严词拒绝，气得复辟狂们曾奏请溥仪：马上赐他自尽。黎不得不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避难。

祖籍世系 讳莫如深

黎元洪，祖籍湖北省大悟县余河乡黎家河。黎家河原属黄陂县石滚会，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拨出。黎氏远祖黎舜臣，原居江西南昌碎瓦墩，于明洪武初年迁来黎家河，至今约六百余年。黎元洪是舜臣的十三世系。黎家世代务农，直至黎父朝相，始弃农投军，参加过对太平天国的作战，由士卒提升至游击（清朝从三品武官）后因故削职，卒于上海。可是，对于黎元洪的祖籍世系，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已经进入高度文明的二十世纪，一位曾经担任过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的祖籍、世系，竟长时期地存在着争议，这真是一桩怪事。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黎元洪本人对其祖籍、世系的讳莫如深。早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六日，即首义

后第七天，武昌《神州日报》发表署名鄂中武士的《革命军总督黎元洪小史》一文，即云“其先世为皖之宿松人，自其祖父商于湖北，遂至入黄州府黄冈县籍，故今为湖北人。”紧接着，同月二十一日，武昌《民国报》第一号载有未署名的《黎元洪》一文，除字句略有出入外，内容与《神州日报》完全一致。对于这些发生在皇城脚下、捕风捉影的荒诞报道，黎大都督不知道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却听之任之。因而被人误解为“黎已承认事实”。于是，以讹传讹，愈传愈讹，甚至连黎元洪是否姓黎，其祖与父的身世等方面，出现了一派无稽之谈。民国元年，薛端性撰写的《华阅随录》中，竟云“元洪的祖父国光，本来姓洪，与洪秀全同族，太平军初克武昌后，即官于斯……”“元洪之名，乃寓原来姓洪之意。”直到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三年，北京出版的《民国人物传》及《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等书籍中，仍然因袭上述的错误说法，皆云：“他的祖，原系安徽宿松，从祖父起即经商湖北，遂入籍黄陂。”与《神州日报》的文章仅一字之差，只将黄冈县改为众所周知的黄陂县。

熊斌简介

魏邦卓

熊斌（1893—1964）字哲民，亦作民哲，大悟县吕王区熊家畈人。幼年时在家乡读私塾，师事刘复，天资聪慧，喜爱书法，九岁便能写屏联，字迹隽秀，声誉满乡里。辛亥革命间，熊斌受新思潮影响，负笈求学武汉，后毕

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先后任齐燮元，吴佩孚、李济琛、孙岳、冯玉祥等部参谋长，曾带领陆军大学学生数十人赴苏联参观学习。1925年，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1926年，冯玉祥去苏联考察回国，宣布接收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就任国民军总司令、熊任国民军总参议。1928年，冯玉祥与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联合北伐，旋冯玉祥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熊斌随冯南下，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后改任冯玉祥部驻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自1925年以来蒋、冯出于多种原因，几度联合，又数经进裂，其间关系十分微妙复杂，熊任事南京对于联络和协调蒋、冯之间的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到1930年，冯阎联合倒蒋，爆发中原大战，熊斌任冯部军事总顾问，对主持和议、结束战争、扭转局势、出力颇多、遂得蒋介石器重。战事结束，适值“九一八”事变，熊斌被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部航空署长，参谋本部次长。从此他脱离冯而依蒋、但与冯仍保持私人情谊，从无间断；冯部诸将领对他仍表示尊重，称之为熊先生。熊持重干练，八面玲珑，处事接物豁达有度，深得蒋介石信任。某年，蒋曾派训练总监张华辅赴日本参加“天皇诞辰”观礼。临行，蒋面谕：“如伪满出席，我即退席。”张资历虽深，但拙讷无文、不善辞对，回国时向蒋汇报说：“满洲国代表入席，我就退了席”。蒋顿时声色俱厉地斥责：“什么满洲国？谁让你承认满洲国？”张羞愧、俯首无言。蒋后来在报告上批示：“张华辅有辱国体，以后遇有此类事宜，必须干练如熊斌者方可胜任”。此文批出后，熊斌一时声价十倍。抗战开始，熊斌先任军委会总办公厅主任、军令部次长、兼新闻局局长，战时运输统制局局长等要职，后调任西安行辕主任兼陕西省主席。抗战胜利后，任北平市市长。

熊斌任军令部次长期间，凡蒋下达手令都由他亲自处理，军令部长徐永昌（实为阎锡山派往蒋政府的代理人，有时不到部，来了也很少处理实际事务，有所批复，亦多以熊斌意见为重。熊才气横溢、擅长公务，处事利落、果批断、复明确、周到，虽公务繁重，但忙而不乱。对下温文平易，很少疾言厉色，受人尊敬。他身边无帮派体系，用人重才能，随遇而取唯其故乡塾师刘复，常在秘书室供职，为办理书信。楹联等应酬文字，熊对他十分敬重，执弟子礼甚谨，可见其尊师重道一面。投蒋以后，但以服从元首，勤于所事，明哲保身为务。在军令部老成稳健，对拥蒋反共不表积极态度。和董必武间有往来，亦仅限于同乡情谊，以老前辈，对董老十分钦敬、常亲自迎送。与蒋的嫡系及党团、特务组织常怀戒心，敷衍应付。1940年军令部秘书李惕乾准备投考军委会外事人员训练班，想藉此出国工作。这件事首先须经工作单位军令部批准，李打了报告。熊对李的报告留中不发，经李面求，熊回答说：“你想的不合适，等以后再告诉你”。原来这个训练班是戴笠办的被录取的都要加入军统，却不一定担任外事工作，目的在网罗特务。这说明熊对下级的爱护和对军统内幕的不满。如此不入污流，是颇不容于世。终以熊深得上峰信任，又兼沉潜谨慎，灵活圆滑，使各方关系融洽，虽然有嫉之者，亦无由谗谮。

1964年熊斌病故于台湾。

材料来源：

一、《湖北历史人物辞典》（336页）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

二、《湖北省档案资料》（增刊）（40页）

省方志办公室、省档案馆编研处合编1982年8月